

## 父亲常迴的两个密友佳邻

○常振明

我们家最早住清华西院，那时候的邻居有吴晗、张岱年。后来我们家搬到照澜院，跟钱伟长家住邻居。我出生的时候搬到清华大学九公寓，那时候的邻居有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、胡健，楼下住工物系何东昌、工程力学系杜庆华——也就是著名播音员杜宪的父亲，前楼住着张维、陆士嘉夫妇，是杰出的力学和流体力学专家，现在非常知名的音乐人、脱口秀主持人高晓松是他们的外孙。

应该说，我们小时候所受到的教育熏染，不止来自父母，还来自清华园，影响最大的是父亲的两个交往密切的师友：钱伟长和孟昭英。

小时候一到周六晚上，父母就带着我和哥哥姐姐去钱伯伯家串门，对我而言，他不是声名赫赫的大教授，就是胖乎乎、笑起来跟弥勒佛一样的钱伯伯。他们家里永远有各种糖果，运气好还能碰上新鲜水果。在钱伯伯家父母也不管我们，任由我们吃和玩，那是我们每周的小节日。

钱伯伯是大学问家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一级教授。他当年以文史满分进入清华，那一年的考题是陈寅恪先生出的，有一个著名的对下联的题目，上联为“孙行者”，有人对了“祖冲之”，还写了一篇古意盎然、文采飞扬的《梦游清华园赋》。陈寅恪非常满意，把卷子拿给在清华兼课的北大副教授钱穆看，钱穆觉得字迹有点像自己的侄儿钱伟长，放榜后发

现，果然就是钱伟长。

钱伯伯在进入清华时严重偏科，他的数学、物理、化学、英文，加起来才25分。钱伯伯刚进清华，“九一八事变”就爆发了，他坚决弃文从理，觉得只有学理才能救中国。钱伯伯在吴有训等名师的帮助下，以一套自学方法和扎实的学风，从一个勉强及格的学生，几年后变成最优秀的物理系学生。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应用数学博士学位后，钱伯伯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哥根海姆实验室跟着冯·卡门教授做火箭导弹弹道研究，成为国际学术界一颗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新星。

钱伯伯怀揣报国之心，历经波折回到国内，1952年院系调整时任纯工科的清华大学教务长，1956年任清华大学副校长，兼任教务长和力学教授。

我们一到钱伯伯家，母亲就跟钱伯伯的夫人孔祥瑛干活聊天，她们俩也是清华附中的同事。孔祥瑛是清华附中的第一任



钱伟长、孔祥瑛学长夫妇

## □ 名师轶事

校长，圣人苗裔，孔子的75代孙。父亲则跟钱伯伯在一边说话。他们互称先生，最喜欢讨论的，就是谁有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，值得关注，哪本书或者哪篇论文的观点有新意，但可能还有哪些问题，还需要哪些验证。我太小，哥哥姐姐们都不带我玩，我只能在钱伯伯和父亲的膝前跑来跑去，钱伯伯有时会一把抓住我，跟我闹着玩。他有一次跟我父亲开玩笑：“你的这个儿子，最应继承你的衣钵。”父亲点头微笑，似乎深以为然。

钱伯伯不拘小节，大热天喜欢袒胸露怀，扇着大蒲扇，他有时哈哈大笑，有时声音沉稳严肃，似乎在批评什么；父亲的声音总是不疾不徐，平静有力。钱伯伯说话很有意思，慢条斯理，总感觉他话没说完，说半句，再让你琢磨后半句。

哥哥姐姐大了，父亲常带我一个人到钱伯伯家，钱伯伯一边跟我下象棋，一边跟父亲谈话。有时候钱伯伯会在肯綮上点拨两句，我当时棋力还弱，钱伯伯的几句话会给我启发，他善于抽离棋路，左右互搏，站在对手的角度去做较长的算度，钱伯伯笑嘻嘻的点拨往往正在关键处。有时候他输两局给我，我非常得意，父亲就立刻停下来跟我说，这是让我，不要翘尾

巴，我还差得远。

我们那个年代，父母很少给孩子正面的肯定，今天总会有一些新的教育方式，告诉我们应该肯定孩子。我时常想，其实任何一种教育方式，都可能造成人性的解放或压抑，关键还是看父母本身，是不是以高标准要求自己。如果他们也是在不断追求和否定旧我之中，孩子就会看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广阔空间，不会顾影自怜和自以为是，这未尝也不是一种优良的教养方式。

父亲另一个终生的师友是孟昭英先生。孟先生是中国无线电之父，加州理工学院博士，他当时对无线电的研究水平站在世界前沿。

1949年开国大典游行，清华大学物理系师生推着一部移动式微型无线电发射台，一边游行，一边向全世界发布新中国成立的讯息。这台机器就是孟昭英带领青年师生自制的，代表了老清华物理系的科技水平。

1952年院系调整，经据理力争，清华大学于1952年9月成立无线电系，系主任是孟昭英，第一副主任是我父亲。他们联手和其他老师一起创办一个全新的系，从教材、教师、学科布局、课程设置、课题确立上，配合默契，互为支持。

一般周日上午，父亲会带着我去孟伯伯家串门，说是串门，其实主要还是谈科研和工作。孟伯伯的风格跟钱伯伯迥异。他身材清瘦，眼神锐利，不苟言笑，不怒自威。孟伯伯克己甚严，不管寒冬酷暑，头发一丝不乱，衣着严谨。在他的家里，不能像在



合影右起：常迥、孟昭英、冯炳铨、王瑞骥

钱伯伯家一样随便。孟伯伯家极整洁有条理，有我一个固定的小板凳，旁边放着连环画和为我准备好的糖果点心，我不能乱说话，不能乱摸乱碰。

我那时候小，觉得父亲和孟伯伯的谈话很没有意思，而且他们经常说着说着，就开始说英文，我也听不懂。孟伯伯在美国大学教过书，他的英文发音、表达水平超出一般英文系教授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怕他，我觉得他的学生们也会怕他。但我感觉父亲和孟伯伯之间非常亲近和信任。20世纪80年代后期，父亲病重住院，他时而清醒，时而昏睡，我在旁边陪床。孟伯伯来看他的时候，他正好醒着，他微笑着跟孟伯伯打招呼，两个人就像久别重逢的兄弟一般，那清澈和放松的笑意，是我难得在病后的父亲脸上看到的。

孟伯伯比父亲大几岁，极有主见，也极为倔强。1957年，对他的批判会开得一次比一次严酷，他一开始总是据理力争，后来清华大学领导出示对他的处理决定，他看完全文后说：“你们漏了一条，‘我反对与苏联的这种不平等交换的贸易关系’。”加上后，他认真地在处分书上签名，成为清华第二号大右派。头号大右派是钱伟长。

1957年，父亲也被定为右派，清华大学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中，对父亲的批判一直跟钱、孟挂在一起，大字报上写满了“孟常反动学术权威”，父亲的罪名之一就是对钱、孟的批判时有抵触，不积极主动地跟他们划清界限。父亲在批判中最为痛苦的，是出于保密理由，有很多关于雷达和信息处理的课题不让他参加，这对终生以学术为生命的父亲来说，是另一种形式的极刑。父亲在外被批判，在家还是一

如既往的慈祥温和。作为父亲，他努力地支撑起一块儿小空间，让我们三个儿女不受影响，虽然我们也感知到巨大的动荡，一切都跟以前不一样了。

孟伯伯有着绝不妥协的抗争精神，他的耿介不屈，也曾经直接帮助过父亲。1968年，无线电系的一派造反派把孟伯伯抓去，用手枪逼着他交出钱和存折，以“充实革命经费”，遭受毒打之后孟伯伯被关到四楼。我父亲和马世雄教授也同样遭到带枪的逼迫，一并关在楼里。孟伯伯不想白白被人折磨，他把宿舍床单撕开，结成绳子从四楼窗户外垂下，攀爬出来打算逃走。下滑到三楼，布绳被缠住，孟伯伯直接从三楼摔到地上，断了一条大腿。虽然造反派嘴硬，但是看见人受伤之后也只好把我父亲和马世雄教授放了。那时候孟伯伯也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如果不是他以命相争，不知道听话和温和的父亲还会受多大的罪。

“文革”后孟伯伯给学生们辅导英语，以让他们能尽快申请到国外的大学学习，这一教就经常到深夜。工友等得不耐烦，干脆把门一锁走了。孟伯伯那会儿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一句废话没有，推开窗户直接蹦到马路上，这样高龄做危险动作，他从不以为意，他那条曾经断过的腿，他也不放在心上。

1974年，父亲从无线电系调到自动化系工作，在工作上 and 孟伯伯没有直接的关联，但父亲和孟伯伯依然亲密。他们在学术上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止，每逢春节，或者是父亲到孟伯伯家，或者是孟伯伯到我家，他们总是把对方当成第一个拜年的对象。他们彼此的坦诚和尊重，是我看到的最为美好的情谊。